

第十七章

西贡之行

应法邀请 赴贡访问

在中法军队交防期间，我一面参加中法越三方的酬酢活动，一面办完河内结束工作。我在越南的最后日程便是西贡之行了。

早在1946年1月15日，圣德尼就邀请我访问西贡。他说：“堤岸（西贡华侨聚居区域）情况确趋平静，极盼您能赴西贡一行，法国驻印度支那高级专员达尚礼很愿与您会晤，并可实地视察华侨情况。我在西贡获悉，戴高乐将军已拟定中法未来的友好合作的种种计划，中法在渝谈判也正在顺利进行。君如决定赴贡，我愿陪同前往。”我答称，本人极愿赴贡一行，惟此举须请示政府批准。1月19日，我特电向重庆外交部请示。

3月1日，即中法协定签订的翌日，王世杰与我谈话时，曾嘱我再回河内办理结束工作，然后赴西贡访问法国高级专员达尚礼，并会同驻西贡总领事尹风藻（也是我青年时代的震旦同学）慰问侨胞，并解释中法新约精神，略事徘徊，即行归国。

现在受降交防任务业已完成，我即通知法方，拟去西贡访问。3月29日我在河内乘法机飞往西贡。

访问达尚礼

初到西贡，顿感气候酷热，与越南北方比较，大不相同。3月30日黄昏以后，在法国驻印度支那高级专员公署外交顾问格拉腊克陪同下，我访问了达尚礼海军上将。我和格拉腊克二人进入接待大厅（既是客厅，又是餐厅）时，达尚礼正同一位柬埔寨的亲王谈话。看见我到来时，立即示意这位亲王结束谈话，并与他握手告别。

这位法国驻印度支那的高级专员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也两度出家披上袈裟，以殖民主义战争起家，又以殖民主义战争的失败而告终。一生颇为奇特，兹简介如下：

乔治·蒂埃里·达尚礼海军上将1889年生于布雷斯特，自幼酷爱海洋生活。他的父亲是法国海军军官，乃以其父为典范，1906年进入海军学院。1911年任海军中尉，自1912年2月至1914年1月，在迪叶拉号巡洋舰上服役，参加了殖民主义的摩洛哥战争，屡次见到利奥太元帅。1917年参加反潜艇巡逻队参谋班后，升任海军上尉，任都尔特雷勒号巡逻舰舰长，并以抢救阿布达军队的运输而闻名。

第一次大战休战时，法国土伦港海军提督拉卡兹海军上将聘他为参谋。1920年他受宗教信仰的感召，放弃海军生涯，遁入加尔默罗会为修士，后晋升为圣三会路易神甫。十二年后，他又升为巴黎加尔默罗会教区修道院院长。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他卸下袈裟，重披戎装，被

派至瑟堡区海军参谋部，继而担任一艘战舰的指挥员。1940年6月，他奋勇保卫瑟堡兵工厂，以致被德军俘虏。但在运俘舰前往德国途中脱逃，并成功地回到英国。

1940年7月1日，戴高乐将军创建自由法兰西海军，1943年达尚礼在戴高乐将军领导下，成为自由法兰西海军的领袖。1940年8月30日他企图号召原法属西非各地归顺戴高乐领导的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当时法国吉罗将军在美军的支持下，与戴高乐对立，吉罗控制着塞内加尔的达喀尔港，坚决不肯归顺，达尚礼于9月23日试图与达喀尔港当局接触，当他乘坐巡逻艇前往时，要塞司令布瓦松竟开火以对，达尚礼因而受了重伤。

他伤势渐愈又以矛头转向加蓬。他在萨伏尔让·特·布拉柴号舰上指挥海战与勒克莱上校率领的地面部队协同作战，在水陆夹攻下，终于占领了利伯维尔和让蒂尔港。继而他作为自由法兰西舰队指挥员，对维希政府在各港内所封锁的商船重新进行装备。

1941年1月，戴高乐任命达尚礼为帝国海军委员会委员，并派他访问加拿大，7月任命他为法国驻太平洋高级专员，并赋予文武全权。1942年他出访华盛顿，1944年回到巴黎任戴高乐的副参谋总长和北海海军上将。1945年他任海军高级委员会副委员长和海军总监。1945年4月14日，他作为法国代表之一，出席旧金山会议。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他拥有高级专员兼总司令的头衔来到印度支那，妄图恢复法兰西殖民统治。

1947年3月，他返回法国，重新脱下海军上将戎装，再度披上袈裟，遁入阿佛隆的加尔默罗会修道院。他放下屠刀，虽未成佛，但也落得个善终。1964年9月，达尚礼在阿佛隆逝

世，终年七十五岁，戴高乐曾亲往参加他的葬礼，并为他执绋。^①

正在达尚礼重温法帝国主义的美梦，俨然以印度支那总督自居的时候，我来到西贡访问。一俟那位柬埔寨亲王辞出之后，他即笑逐颜开地引我和格拉腊克坐在一起谈话。谈到这次中法协定的签订，他们两人异口同声地赞扬我为中法友谊出了力。我当然谦虚一番。提到海防事件，双方都不约而同地引以为憾，但达尚礼却脱口而出地指出：“据报，一切障碍都来自何应钦将军”（据萨朗回忆录所述，萨朗重庆之行，由勒克莱的参谋克雷本上校陪同随往，萨朗回越后，克雷本仍留重庆同法国大使馆武官吉业马少校一起继续办理有关接防交涉，并利用法国大使馆无线电讯系统直接向西贡拍发情报。该回忆录第376页上即有克雷本获悉设置种种障碍的是何应钦的记载，可见达尚礼的据报，就是指的克雷本的情报而说的）。当时，我听了暗暗吃了一惊，因为众所周知，陈修和是何应钦的学生和老部下。但我仍佯装糊涂地说：“对此，我却毫无所闻。”我反过来直率地指出：“海防事件的酿成，主要是萨朗将军似乎太急躁了些！”达尚礼听了微微点头。谁想我这句话却无意中打中了要害，谈到点子上了。原来，达尚礼确实向巴黎告了萨朗一状，表面上派萨朗作为他的军事代表，先陪同武元甲到大叻，继陪同胡志明到巴黎会谈，实际上是悄悄把萨朗调回巴黎，借以保留萨朗的面子。^②

谈到这里，达尚礼留我进便餐，仅格拉腊克一人作陪。进餐时，达尚礼喋喋不休地谈说他将要去大叻主持一次法越会议。他说：“大叻会议是继河内法越初步协定以后，为法越正式谈判（即枫丹白露会谈）作准备的中间会议。这一系列会议都是在法兰西联盟范围内和印度支那联邦范围内进行的。”他这

样说是想表明，这是法国的国内会议，而不是国际会议。以后达尚礼把谈锋转向大叻的风景。他说：“大叻是海拔达1,925公尺的高地，那里有气候疗养院，有印度支那总督的别墅，是风景幽美、气候凉爽的避暑胜地。”言下之意，似乎说他自己实际上就是印度支那总督，他主宰着这里的一切。他的灵魂深处仍在重温法帝国主义恢复远东最大殖民地的美梦！

餐罢不久，我就告辞。格拉腊克仍陪我同车，送我回到旅邸。

访问达尚礼海军上将是西贡之行的主要任务，完成后原拟按照王世杰的指示，前往华侨聚居之地——堤岸去慰问侨胞。但河内刚由一方面军交防，河内—西贡航线亦刚开始恢复通航，而法国控制的军用运输机则很少，不能天天有班机。再者，由于我来得仓促，尹总领事未能事先联系堤岸侨胞筹备一次欢迎大会，加以西贡入晚到处冷枪声，远不如河内安全。于是，尹总领事就向我建议召集侨领二十余人，开了一个座谈会，由我解释中法协定的精神。至于华侨遭受法军劫杀案件，尹总领事已准备好表格，就嘱各侨领转知受害侨胞一一填表汇送重庆，以便向法方提出交涉。至于日军南侵期间汉奸勾结日军为非作歹事件，重庆国民党中央已决定停止调查，我将重庆给尹总领事的公函交给了他，由他向各侨领宣读，座谈会就告结束。

1946年4月2日，我从西贡乘法军用运输机飞返河内，3日向卢汉司令辞行。临别时，卢汉赠我日本军官佩刀一柄，此刀柄上镌有花三朵，系上尉级士官佩刀，日本崇尚武士道，剖腹自杀，即用此刀。

访卢汉时，得悉美方有军用运输机于4月5日由河内飞往广州，我就乘此机离开河内。

越南之行就此结束。

① 译自《1954—1955 年法国当代人名录》第 295 页。

② 详见《萨朗回忆录》第一卷第 352 页。